

构建以郑州为核心的战略支点网络之路径

中原经济区涵盖了河南18地市及周边省份的一些城市,是一个拥有44个城市、1.7亿人口的超级城市群。中原经济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区域,其构建和发展不仅对中原经济区内城市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甚至于对中部地区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区域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原经济区究竟如何构建和发展,才能既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又能走与其他城市群不同的发展道路,实现快速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虽然中原经济区的发展需要郑州市这个“龙头”型特大城市发挥重要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但仅此还不够。根据区域发展一般规律及中原经济区整体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构建以郑州为核心的战略支点网络是中原经济区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经济区战略支点网络的含义

战略支点网络是指经济区内的大中城市网络,这里边的大中城市是指对中原经济区发展具有支撑协调作用的各城市级城市。从网络化的角度研究城市,就是寻求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和互利关系,每一个城镇在其网络中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定位,为整个网络提供服务,从而推动着整个城市网络的正常运行和能力的提升,不断提高效益,即城市网络效应。

形成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经济区战略支点网络,就是以郑州为核心,以中原经济区内各城市级城市构成的城镇体系为主体,以主导产业为物质基础,以交通运输为纽带,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层级联动、协调发展的中原经济区空间布局。

二、构建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经济区战略支点网络的对策

1. 必须培育和强化郑州在中原经济区内的核心地位。在中原经济区内,郑州市必须努力成长为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具影响力和辐射力的中心城市,这需要加快发展现有的产业体系,建设大型产业基地,整合重组优

势产业,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大集团,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2. 依托各城市级培育战略支点网络的增长极。中原经济区目前还处于点-轴发展阶段,其战略支点网络中的增长极培育主要是依托以各城市级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在中原经济区内除郑州、洛阳等市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外,其他地区城镇化发展仍处于由中心聚集向轴聚集的过渡阶段,促进极核发展和强化城镇发展轴线的活力仍是区域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

3. 利用发达的交通网络形成生产要素流通的主渠道。从发展环境、条件、问题来看,中原经济区内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对比较薄弱,各地区之间的连通性较差,导致区内各城市级经济增长极和跨省域的经济走廊很难快速成长起来。所以,要继续完善铁路、公路、航空等立体化的交通网络,以强化区内区外经济交流。在铁路线上,争取推进“郑济、郑太、郑合”等铁路的立项和国家审批,加上在建或将建的石武、徐兰、郑渝、商杭高铁,郑州变“十字”枢纽为“米字”枢纽,实现中原经济区内外的铁路一体化,建立中原经济区的经济发展骨架;在公路方面,在保持高速公路里程优势的基础上,继续扩大高速公路的覆盖范围,并将省道与周边省份省道接轨,从而扩大中原经济区的辐射范围,创造更大的市场,占有更多的经济腹地;在航空方面,进一步加大郑州、洛阳、南阳机场的软硬件建设,增强机场吞吐量,并规划建设商丘、信阳和安阳支线机场,完善民航运输体系。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将中原经济区打造成为全国重点综合交通枢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承上启下的“腰部”。

4. 必须树立区域整体发展意识。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和构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各城市级发展的思路统一到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上来,确立区域协调发展理念,为形成战略合力奠定思想基础。要防止“弱区城市化”趋势,减少内耗,推动区域内部的合作共赢,强化中心城市经济中心地位,增强中心城市的经济能量,加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逐步形成共同区域利益和区域意识。

郑州大学商学院 牛树海

坚守或逃离是一线城市年轻人遭遇的两难之境

北京的夏天,早上8点,太阳已老高了。从四惠到大型路短短的几站,坐公交需要三四十分钟。“北京太大了,不适合生活和工作。公司在中关村,客户在国贸,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同样一个小时,基本可以在济南从南跑到北,从东跑到西。”2008年毕业之后来北京工作的刘文源(化名),现在回了山东老家,在枣庄的某警区做宣传工作。(8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简称”,逃离抑或是坚守?现在的年轻人,面对本土一线城市,正上演着一出生存版的而非婚姻版《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现在的一线城市,即便从正面意义上说,也可视为一些人的欲望都市。作为选择的对象,它对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构成吸引力。作为一线城市,它无疑比那些二线、三线城市汇集了更多的财富资源、文化资源,存在着更多的生活机会。另外,一线城市还有着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要创造自我的价值,人要寻找生活新目标,人要在一种社会结构中完成对自身的各种期待,一些人凭借现有的经验,会觉得这一切只有在一线城市才能得到实现。

人们对婚姻有个比喻:婚姻好比是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穿着的人才知道。这个比喻也可借用于正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在生存层面的感受,就是适宜不适宜在一线城市生活,只有那些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明白。机会就是诱惑,机会就是可能性,捕捉住

了机会就有可能捕捉住了成功。一些人之所以选择了坚守而不是逃避,还是他们的创业梦想说服了自己的内心。年轻的时候人人都有梦想,为了梦想可以忍受委屈,可以忍受一般人忍受不了的东西。而选择逃离者,也有他们的道理。每个人的出身、教育背景、经历不同,价值认知不同,最后的选择就会有差异。在一线城市坚守可能是出于对自身发展的理性判断,选择二、三线城市发展同样可能是基于一种理性判断。一线城市有一线城市的难处,二、三线城市亦有二、三线城市的好处。一线城市的生活机会多,但是它的生活成本也高。这类城市利于年轻人的自我实现,但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种种现实,民生艰难的种种困境,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坚守与逃离,都

不是说上一句话那么简单和轻易。坚守需要坚守的条件。譬如,安居才能乐业,而房价飞速飙升,买不起不得哪怕是个仅能容身的“蜗居”,如何坚守?短时期可以坚持,长时间身心俱疲,还能熬得下去吗?

一线城市中高昂的房价、拥挤的交通、巨大的工作压力,使得一些年轻人不得不选择逃离,但是回到了二、三线城市,就能进入理想之境吗?要知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当年从二、三线城市某个逼仄的生存空间走向一线城市的。逃回二、三线城市,多数人会生出物是人非之感,甚至是物非人非。行行复行行,选择这条生活的道路究竟是对是错,也许他们走着走着就知道了。

今语

产妇剖腹产惨死手术台 手术室医生集体出逃



据报道,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红十字会博康医院,一妇女剖腹产下一子后,开始大出血……可产妇的丈夫接到院方的病危通知书后,手术室内从此便杳无音信,产妇的丈夫破门而入,空空如也的手术室里,医生护士全都不见了踪影,只留下赤身裸体的妻子躺在手术台上,手脚被绑,全身冰凉……产妇的丈夫顿时昏倒。

王涨 绘

展望中原经济区 畅想郑州新作为

特别报道

编辑 陈培培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szwx@zynews.com

中国迎来民调时代



表达权、监督权。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及个体极端行为时有发生,这是社会矛盾爆发的主要体现,而预警机制的缺失又往往使这些矛盾处于失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矛盾民意调查对各级党委政府而言,显得十分迫切而又必要。

“现在公众对于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愿望越来越强,不仅表达自己对于现有的公共政策的看法,更多的还希望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很多事情,政府只需要告诉民众一个结果,或怎么执行政策。但是目前,民众对于知情权的要求大大提高,互联网加速了与政府有关的信息传播的速度,对政府的政务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政府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倾听民意的时代。”他进一步解释道,“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收集民意可增强政策执行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其次,收集充分的民意可以看到民意的未来走向,以便于政府可以尽快作出政策调整,包括建立预警体系;再次,收集民意可多角度保证政策的合理性。”

“民意对政府的重要性在提升,民意调查机构正是一个科学、系统地把民意传递给政府的重要渠道。”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接受采访时说,“一方面是民众不满足于仅靠媒体、人民代表表达诉求,还希望继续拓宽诉求渠道。另一方面是政府开明了,愿意听到民意呼声,使决策有更多民意基础。这两方面力量结合,推动了民意调查的产生。”

发展曲折,形态年轻

我国是较早进行现代民意调查的国家之一。有关专家介绍,1922年11月24日,我国留美归国的心理学硕士张耀翔,在北大四合院期间,进行了我国最早的一项现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

由于我国各种特殊的政治现实,这次民意调查并没有迎来这个行业的勃兴时代。相反,从1922年到1982年的60年间,我国大陆没有出现一家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民意调查活动几乎一度销声匿迹。“1986年以前,我国政府基本没有系统的利用民意进行评估的机制,所有政务信息依赖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报告机制,不允许独立民意研究机构存在。”袁岳回

顾说。

1988年,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成立,这是我国大陆最早的民间民意调查机构之一。

1988年至2002年,是我国民意研究发展重要的14年。这期间,我国政府进行民意测验的数量大量增加,内容也更广泛,同时允许民间独立市场研究与民意测验机构合法注册,允许民间组织从事民意调查工作。

袁岳对此深有体会,“在这一阶段,民间独立调查机构开始有机会介入一些对于公共项目的评估,如公众安全感的调查、中国大陆地级以上城市投资环境的评估等。而且,媒体开始大量使用民间独立调查机构的相关调查数据。在1992年之前,中国媒体只使用官方数据。”

从2002年开始,我国民意调查行业进入了快速全面变迁的阶段。2003年发生的不少地方民众对于政府的评价,因SARS而引起的政府信息公开化要求,我国政府领导人倡导的亲民风格和对于民众人权的重视在这一年中获得异常的重视。因此,这一年被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定义为显示我国社会和政府快速转型、个人自由和权利空间越来越发展的一年。

中国民调五大类型

目前,我国民意调查机构已呈多元化发展。据调查,大概可分为以下五类,即政府型、高校科研机构型、民营型、外资型、媒体型,等等。

政府型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系统。2003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各省统计局门尽快建立“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系统”,积极开展社情民意调查。

2004年11月10日,江西省成立了隶属于统计局的民意调查中心。同年底,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正式成立。随后,各省市统计局系统下的民意调查机构也相继出现,我国政府民意调查机构初步自成体系。

据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显示,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职能是指导全国统计系统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的工作,组织实施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委托的有关社情民意调查任务;开展统计咨询、相关信息资料加工处理与查询服务;负责经济景气发展态势监测、信息发布及相关科研工作。

近年来,一些媒体、高校科研机构也纷纷成立民意调查机构,比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人民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等等。

与此同时,一些以咨询公司、研究中心、调查公司、信息中心等名义注册的民营调查机

构,更是层出不穷,除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简称“零点”)外,比较活跃的还有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简称“美兰德”)、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简称“新生代”)、北京数字100市场调查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数字100”)、华通现代市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华通现代”),等等。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些外资调查机构也纷纷低调进入我国,让人耳熟能详的有盖洛普(中国)咨询有限公司(简称“盖洛普”)、AC尼尔森,等等。

近年来,为主动了解和回应社情民意,在传媒大战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我国一些主流媒体也设立了民意调查机构,比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人民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等等。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上述调查机构,是在我国调查机构中做民意调查比较有影响的,而更多调查机构仅把做民意调查作为“副业”。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顾问吴涛博士接受采访时认为,在中国的调查机构中,民营的占很大比例,其中专门做民意调查的机构并不多。从目前市场趋势来看,随着中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加速,更多的调查机构,会越来越多地涉足民意调查领域。

“把脉”手段多样化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我国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方式,多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面谈、信函访问、留置访问、网络调查等为主。采访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向记者介绍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民意调查方式的转变,计算机辅助的调查方式已经成为业内广泛采用的一种调查手段。”

从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民意调查机构的所有调查手段里,CATI最为普遍。比如零点的调查方式,仅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就占40%,美兰德占20%,新生代占30%,而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机构高达80%。“CATI非常简便,不仅成本低,还能保证样本的全面覆盖,真正能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而且,访问员拨出的每个电话都有录音备案,可以复查,很难作假。”吴涛说。

让人意外的是,在所有调查手段中,这些民意调查机构仅把网络调查作为辅助调查手段,而且极少使用,因为他们普遍认为“不科学”。在多位受访调查机构负责人看来,虽然网络调查也能出调查结果,但与科学抽样调查出来的结果还是有比较大的出入。

“目前网络调查存在两大硬伤,一是不能覆盖全人口,网民大部分是年轻人;二是搞不

清被访者的真实背景特征,有些被访者男士乱填女士。这样的调查结果不能分析,不好用。”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总经理周江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

“网络调查实际是一种计算机辅助的信函访问方式。”袁岳说,“通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页面,被调查者可以轻松而不受拘束地完成调查。但网络调查的代表性及虚拟匿名等局限性,也使这种调查方式的结果饱受质疑。”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民意调查为民众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加强民主监督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不论用何种调查手段,这种民主教育和民主实践,都将会有力地促进民主意识,推动我国的民主进程。

效果取决于决策者

“以前政府获取民意,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反映的是个案,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调查,政府是被动了解的一方。”李炜认为,“民意调查最大优点,在于调查范围更广泛,调查方式更专业、调查手段更规范,结果更为准确全面,而且政府居于主动地位了解民意,对政府一些决策更有参考价值。”

不过,“由于缺乏制度规定,民意调查结果在决策中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民主观念和民主作风。”黄小勇认为,“不重视民意具有极大的危害性。长期以来,某些决策者认为决策事务是专业性技术性事务,认为决策类似于在追求数学意义上的真理,无须考虑民意。然而,被决策者忽略的民意最终总要参与进来,并往往形成对决策的抵制和反对。”

黄小勇举例说,近几年发生的厦门PX化工项目的流产、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暂停、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搁浅,都是典型事例。他呼吁,决策者应抛弃对决策事务的传统工程技术观念,而应将决策事务看作是关乎民众利益的公共事务,必须听取和重视民意。

当然,“不排除一些决策者因为民意调查结果与部门意图之间的冲突而罔顾民意,只有民意调查结果获得广泛的公共舆论支持,在社会压力下才会对决策形成重大影响。”黄小勇说。

但大势所趋是,“在民意型决策时代,政府的第一要务已经不再是解决决策者脑子里有没有民意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民意如何进入决策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最后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充分综合各方利益,听取民意才能让公共决策效率得以整体提升。”